

## 居安思危 警钟长鸣

抗日战争期间，北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，受尽日寇的蹂躏。1938年8月8日天刚蒙蒙亮，正下着雷阵雨。雷雨过后约8时左右，日寇飞机从涠洲向北海飞来，在这节骨眼上，冠头岭防空监视哨摇往市区防空警报中心的电话不通，只好通过驻军的一个通讯排转到商会。电话虽通了，但为时已晚，敌机顷刻飞到，并开始了轰炸。当天下午，身穿红背心的桂军175师第465团和466团的工兵，在市内大水沟挖掘防御工事，导致地面目标明显，故敌机更加疯狂地轰炸扫射，炸死十多个工兵和一百多群众。当年参加防空救护队的林宝珊老先生回忆说：“我年轻时有冲早凉的习惯，那天（惨案发生的当天）早上8时左右，我正在冲凉，突然听到爆炸声，大地的震动，把盛在冲凉盆里的水涌了出来。我立刻去参加救护工作，从早上9时到晚上9时，忙个不停。敌机当天轰炸好几次，尤其是下午对大水沟的轰炸死的人特别多，被炸的现场真是惨不忍睹……”这就是北海历史上的“大水沟惨案”

如果说“大水沟惨案”是日寇欠下北海人民的一笔血债的话，那么，两年半后的1941年3月3日，日寇对北海市区突然入侵后的奸淫掳掠，滥杀无辜的罪行更是令人发指，这就是史称的北海“三·三”事变。虽然事变至今已60余年过去，但北海人民，尤其是曾亲身经历过那场浩劫的老北海，不会忘记那一段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。

1941年3月1日，日军派出数艘小汽艇，从冠头岭南万外的海面起锚，沿北海、高德至岭底的一带海面游弋，既不开枪放炮，也不驶近岸边。起初市民惊慌，紧急疏散到郊外。3月2日，市民见情况和昨天差不多，因此思想麻痹，又纷纷返回市内。3月3日凌晨，日军航空母舰一艘，驱逐舰5艘（也有史料记载是4艘），登陆艇和汽艇20余艘入侵北海港。一千多名日军在夜间和大雾的掩护下，先后在冠头岭和岭底登陆，抢占制高点并切断北海与合浦的通道，然后从外沙和

龙王庙（今民权路北面）侵入市区。当时北海根本没有军队驻守，只有合浦和北海的自卫队百多人，与日军交火时不堪一击而溃散。一些警惕性较高的市民听到枪声后，纷纷逃往马栏、横路山、龙潭及三合口等农村避难。没能逃离的市民，则落入日寇的魔掌。

日军占领北海海关为司令部，珠海东路和中山东路的天海楼至邮电局，则成了日军的扎营地；市区周边的高德、地角等渔农村，也有少数日军把守。

据当时的《大公报》记者龙起翔回忆写道，1941年3月3日凌晨，日寇“占据北海后，即行祭奠中野顺三（有目击者提出祭奠时间是3月8日。笔者注），并在‘丸一药房’墙上书写‘北海登陆无血纪念’”（注：日本人中野顺三是北海“丸一药房”的老板，因间谍嫌疑于1936年9月3日晚被北海驻军便衣队刺杀，史称北海“九·三”事件）。随即，北海遭受了空前的浩劫。

90岁的包姓老人说，他家住在珠海东路，目睹日寇挨家挨户破门而入，大肆抢劫。所有商店里的一切商品和市民财物，全部被抢。捉到的男市民被强迫当役夫，日夜不停地把抢到的财物搬上日寇的登陆艇，再转运到日舰上去，一些小艇主也被日寇强迫抢运货物。一天，有一役夫和一摇艇婆被迫抢运货物时，役夫很气愤，并表现出不满情绪，毫无人性的日寇用军刀把他的头砍了下来，那位摇艇婆受此惊吓得病，几天后便死了。日寇对停泊在外沙内外港和地角的渔船和货船，劫去财物后即泼上汽油焚烧。

80多岁的陈锡辉老师说，在“三·三”事变期间，他被日寇拉去做苦役，幸好有机会逃了出来。可最惨的是北海的妇女，她们纷纷逃到北海的法国领事馆和各国的教堂、医院躲避，以为那儿安全。英、法、德、美等国的教堂和医院，也公开收容难民。然而，完全不顾国际惯例的日本法西斯强盗，入侵北海即“通令英、法教会不准收容难民”。除德国教会设置的收容所（因德国与日本是轴心国）和英教会原来的普仁麻风院（旧址在今海城区三小，该院于1955年11月迁往白

屋，但旧址门前还留存“封界牌”，示意此为麻风院，外人不准内进。日寇害怕被传染麻风病而不敢闯入）外，日寇强行闯入各国设置的收容所驱赶难民，可怜的妇女不少落入日寇的虎口惨遭轮奸。

笔者小时候听祖母讲过我们祖孙俩在“三·三”事变期间的一次遭遇。那时我母亲到别的地方躲了起来，让一岁多的笔者和祖母在家。一天，一个日寇军官闯入笔者家，看到一老一幼在铺面，便拿出一张女青年的照片，对着祖母指指照片后，又指指坐在祖母身旁正在玩耍的笔者，向祖母叽里呱啦喊个不停。祖母听不懂鬼子的话，但从鬼子指指点点的手势中，知道鬼子想抓孙子的母亲，于是向鬼子用手指反复指着地下，并做闭上眼睛的表情，表示孙子的母亲已经死了。鬼子军官领会了祖母的意思，于是拔出指挥刀，把刀架在笔者的脖子上进行威胁，这时祖母紧抱着笔者闭上双眼，心想到了这个地步，只有听天由命了。约一分钟过去，祖母见没有什么动静，挣开眼睛后却不见了那个鬼子军官，原来鬼子见威吓不成便走了。

90余岁的徐万全老人说：“‘三·三’事变日本鬼入侵北海后，我们大囊村的人全部逃到龙潭村去了。我父亲因年老有病不肯离家。日本鬼进村后，我父亲被拉去做苦力，每天要挑几十担菜到日本鬼的驻地德国楼（地点为今市公安局）。一天，一个日寇军官带领一帮部下到大囊村，把我父亲抓到跟前，通过翻译问这条村子叫什么地方。父亲回答后，日军官打开一张军用地图，指着其中一个点说：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地方。”说到这里，徐老气愤地说，北海如果没有间谍，日本鬼的军用地图上怎么标有大囊村的具体位置。

一位年近90的王姓老太婆说：“我们全家人走了以后，日本鬼在我们家的床上、衣箱、米缸甚至在饭煲里拉屎拉尿。这些日本鬼真狠毒。”

日寇在北海进行了为期7天的杀人放火、奸淫掳掠后，于3月9日撤离北海。

据1941年3月14日的《粤南日报》报道：“合浦县向中赈会驻粤办事处报

告北海灾情：一、被掳去男女数十人，被杀者百人；二、未逃出的妇女遭奸淫，即躲避外人教堂、医院者亦不免。因奸受伤，现住医院调治者五十余人；三、焚毁渔船数百，民房百余，待赈灾民逾万人；四、不及疏散财物悉被洗劫；五、海关、邮局被迫停业。”

一位钟姓的老北海说，日寇撤离北海后的三日内，市内听不到鸡啼、狗吠、猪叫，因为所有的鸡、狗、猪全被日寇捉光、杀光、吃光。

又据《大公报》记者龙起翔回忆：劫后的北海，人迹稀疏，门户破坏，街上遗下数不清的猪、鸡内脏，臭气熏天，满目疮痍。据另一史料记载：“三·三”事变后的北海，损失无法计算，北海一埠已成死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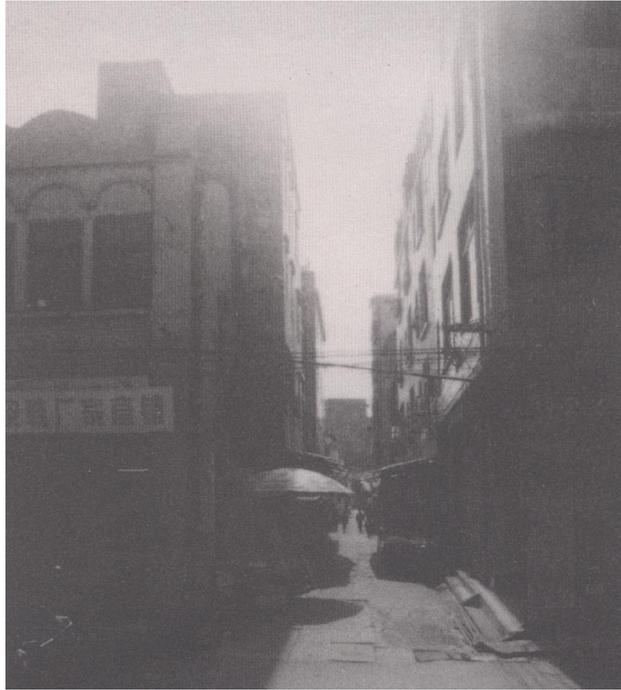
“三·三”事变后，广东省和合浦县均对被劫后的北海，做了一些“加紧救济事宜”的工作。

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，在普仁医院（今市人民医院）的八角楼顶，一位中国士兵激动地挥舞着一面中国国旗，高声向市民反复疾呼：“日本鬼投降了……”曾惨遭日寇蹂躏的北海人民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无不欢喜若狂。但北海人民没有因此而忘记过去，1985年长青公园重建革命烈士纪念碑时，在碑顶安装一个大钟，用来警醒北海人民：在和平的年代里，我们必须“居安思危，警钟长鸣”。



长青公园内的革命烈士纪念碑（远景）

只供阅读 请勿侵权



牛皮巷往昔有一条大水沟（故又名大水沟），是大水沟惨案发生地



革命烈士纪念碑（近景）